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一年第一期（总第 6 期）

深圳大学图书馆印度文献资料室

<http://www.lib.szu.edu.cn>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E-mail:szucis@yahoo.com.cn

2011 年 8 月 2 日

本期要目

【纪念季羡林教授诞辰 100 周年专栏】

在山顶上淡然的人——记季羡林受业弟子黄宝生

首访中华大梦圆

【活动纪要】

“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中印学者研讨“谭云山现象与 21 世纪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侧记

郁龙余教授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组签约

【访问印度专栏】

印度访问报告

【谭云山文献专栏】

中国与印度



2011 年 7 月 11 日，郁龙余教授面送《邀请函》致印度夏尔玛教授（Nirmala Sharma）。



2011 年 5 月 7 日，郁龙余教授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在“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上会面。



《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一年第二期（总第 6 期）

主编：郁龙余

执行编辑：黄蓉 朱璇

目 录

【纪念季羡林教授诞辰 100 周年专栏】

在山顶上淡然的人——记季羡林先生受业弟子黄宝生.....	5
首访中华大梦圆——夏斯特利先生的学术之旅	8

【活动纪要】

印度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我校	13
“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14
中印学者研讨“谭云山现象与 21 世纪中印文化交流”	14
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侧记.....	15
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组签约	16

【访问印度专栏】

访问印度报告	17
泰姬陵断想	24
辛赫校长	25
印度女神的项链.....	27

【谭云山文献专栏】

中国与印度	28
谭云山对室利阿罗频多思想的译释	31
《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出版	35
中国与印度：文明的对话	36

Newsletter of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2011.8.2

Contents

A Temperate Person Standing on Top of the Mountain

——Huang Baosheng, A Brilliant Disciple of Mr. Ji Xianlin.....	5
Realization of the First Visit to China ----the Academic Trip of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	8
A Cross-Party Group Committee of Indian Delegation visited SZU	13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Rabindranath Tagore Held in Beijing	14
Tan Yunshan and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 in 21st Century: Forum on Sino-Indian Culture and Art Held in Beijing	14
Sidelights on Tan Yunshan and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 in 21st Century Forum	15
Pro.YU Longyu has Signed 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Especial Entrust Project	16
Report on visited Indian.....	17
Thought on Taj Mahal.....	24
Kamalesvara Sinh:The President of R.C.S Privately-run Primary School	25
Necklace of Indian Goddess.....	27
China and India.....	28
A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Sri Aurobindo thought From Tan Yunshan	31
A Tiny-step Collection:Selected Papers of Indian Studies has been published	35
Dialogue with Civilization:China and India	36

【编者按】今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 100 周年，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大家。他著作等身，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卓尔不群。他治学严谨，《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著作严格考证，见解独到。这些都与他的治学品格是分不开的。本期特刊发郁龙余教授描写季羡林先生受业弟子黄宝生和“印度的季羡林”夏斯特利先生的文章，以此纪念季羡林先生。

在山顶上淡然的人——记季羡林先生受业弟子黄宝生

郁龙余

在一代国学宗师、世界一流梵文大家季羡林先生诞辰 100 周年、逝世 2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来到北京干面胡同访问了他的受业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著名梵文学家——黄宝生先生。

季羡林终其一生，有两大财富：一是他的精神财富，包括已经出版的三十卷《季羡林全集》，包括他的治学之道；二是他的学生，从狭义上讲有几十位，从广义上讲有几千位，从更广的广义上讲他有无数的学生。

三十卷的《季羡林全集》并不全，但是已经让人惊叹不已。他经历清末、民国、共和三朝，正面遭受二战、文革二劫，而能功成名就、以百岁之身谢世，真是幸之甚矣。治学之道是季羡林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概括起来共为五条：勤勉不怠，惜时如金，为其成功秘诀；预流弄潮，追求真理，为其不死灵魂；用弘取精，灵构妙筑，为其得心常法；学术道德，以身作则，为其立命之本；真情相待，从善如流，为其待友之道。

著作家和学问家的区别，是看有没有为治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季羡林是一位集著作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旷世大学问家。教书匠和教育家的区别，是看他身后是否后继有人。从这个角度看，季羡林是一位学泽广被、生徒和仰慕者如云的大教育家，中国现代印度学的开山者。在季羡林众多弟子中，学术成就最卓著、最令人敬重的是黄宝生先生。

黄宝生，上海人，1960 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学习梵文、巴利文。1965 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现在。比起经受过“三朝”、“二劫”的季先生来，他就可以用一帆风顺来概括。但是，做学术研究总是辛苦的。他秉承季师之风，几十年梵学研究不动摇。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无法推让时，他就努力做到工作、研究两不误。凡是场面上的事，尽量少参与，腾出时间搞翻译和研究。

天道酬勤。尽管他翻译和研究的是世界上最艰深的梵典，但是几十年积累下来，也是已经让人惊叹不已。

他翻译或主持翻译的印度古代经典主要有：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六卷（主译）

《印度哲学》

《佛本生故事选》（合译）

《故事海选》（合译）

《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二册

《奥义书》

他主要的论著和教材有：

《印度古代文学》

《印度古典诗学》

《〈摩诃婆罗多〉导读》

《梵语文学读本》

黄宝生的所译所著，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皆经典。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一生中想有所为，必须有所不为。但是，能够像黄宝生这样，保证所译所著皆经典，实在非常不易。其中，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条，导师的熏陶与指引，这一条应该说十分幸运，投到了季羨林、金克木门下；第二条，靠自己勤勉，几十年不间断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果说，所译是经典有一半靠经典本身的学术史地位来决定，另一半须靠译文的高质量。那么，所著是经典则全靠自己的功力了。在当代，经典不是那么容易打造的。但是，黄宝生的《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典诗学》和《〈摩诃婆罗多〉导读》一经问世，即成业内人士的必读书。毫无疑问，凡是想研究印度古代文学、诗学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读他的上述三本著作的。

《梵语文学读本》是 2010 年出版的新书，但我敢断定，也是一本经典之作。这是一本十六开本、七百多页的皇皇大著，一部梵文文学教材，不但填补了我国缺乏优质梵文教科书的空白，而且它集语法教学、文学经典解读于一体，既是学习的宝典，也是研究、查阅《薄伽梵歌》、《佛所行赞》、《鸠摩罗出世》等七部梵文原作的宝典。

季羨林教梵文，用的是德国学者施坦茨勒（A.F.Stenzler）于 1868 年出版的《梵语基础读本》（Elementar buchder Sanskrit-Sprache）。尽管这是一本简明实用的梵语教材，并于 1996 年出版了它的中文译本（季羨林译，段晴、范慕尤续补），但是中国的梵文爱好者一直渴望有一本专门为中国读者编写的梵文教材。实际上，中国学者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如罗世方克服巨大病痛用 23 年时间自学梵语，并编写成《梵语课本》和《梵文诗文图解》（和巫白慧合著）。从印刷数量上讲，这两种著作满足了不少读者渴望学习梵文的需要。

客观而论，施坦茨勒的《梵语基础读本》十分适合欧洲人学习，罗世方的《梵语课本》、《梵文诗文图解》着力在词法和句法。黄宝生的《梵语文学读本》惠人语声迟，既取西方人语法分析之长，又得东方书院读经之妙，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梵文语法文学教科书。

《梵语文学读本》恰到好处地将欧洲的梵语教学体系和印度的梵语教学体系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梵语教学体系。由于教育背景不同，季羨林留德十年，学到的是

欧洲体系；金克木则在印度庙里学梵语，是印度传统的一套。黄宝生在《梵语文学读本》中很好地将季、金两位先生形成合力，出现了1加1大于2的叠加效应。

黄宝生不但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他在《前言》中说：“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古代语言，掌握语法是一条捷径。第一步学语法，第二步读原典。”解读梵语诗文，如读中国古文，难在句读。黄宝生进一步指点门径：“解读梵语原典的要领主要有三条：一是拆开句中词与词之间的连声，二是拆解句中的各种复合词，三是认准每个词（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形态。只要准确地做到这三条，便能读通梵语原典。”《梵语文学读本》的高妙之处，就是将语法学习和原典研读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黄宝生和他的老师季羨林、金克木相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梵语文学读本》是对西方、印度梵文教材的优势综合，是适用于中国学生的经典课本。

《梵语文学读本》是黄宝生几十年梵典翻译的衍生产品，更是他近几年来为梵文研读班辛勤劳动的结晶。全书由研读班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结合自己心得，整理加工而成，最后由黄宝生审定，译文则全部出于黄宝生的手笔。这种古代书院式的著述方法，对于当今中国的梵文教学，是极富创造性和实用价值的。

黄宝生说，以后还可以编著类似于这本著作的《梵语哲学读本》、《梵语宗教读本》。他还说，中国人编撰《梵汉词典》是早晚的事。和他的老师季羨林一样，黄宝生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黄宝生多次说，他在1960级梵巴班上，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成绩最优秀的。我相信他的这一番话，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想不到”中进行。《礼记·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将黄宝生砥砺成佼佼者，用事业向世人告白：他是季羨林优秀的继志者和事业继承者。

继志与继业是统一的。当我向他讲起深圳大学计划建立“季羨林学术馆”时，他表示大力支持。学术乃天下公器。季羨林的学术精神应该得到继承和宏扬。我请他为计划中的学术馆写点文字。他说：“应该请深大校长写，你先起个草，我可以帮你看看。”朴实无华的几句话，将季羨林的淡泊而真诚的作风活脱脱地和盘托出。

黄宝生的为人和梵学成就，不但在国内获得公认，而且也受到印度学者的高度评价。最近，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印度国宝级的梵文大师、2010年印度最高荣誉奖——莲花奖的获得者夏斯特利先生访问北京。他和北京大学王邦维、段晴教授等亲切交流，并为学生做了多次讲座。他几次说：中国的梵学研究，和德国、英国等研究强国相比，毫不逊色。他作为北京大学的短期访问学者，为社科院的梵文研读班的学生做了一次讲座。他和黄宝生先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位著作等身、周游列国的梵文硕学，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当他得知黄宝生的业绩后，私下里情不自禁地表示：印度每年设梵文荣誉奖，由总统奖给国外六十五岁以上终身研究梵文的学者。他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将郑重推荐黄宝生教授。访问北京之后，夏斯特利又访问深圳大学，我问及此事，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我想，无论结果如何，得到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印度梵学名宿的肯定和赞赏，总是中国梵学的光荣。

学术研究犹如登山，充满坎坷和艰辛，一旦登顶，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受，便一切都淡然了。过去，季羨林是在山顶上淡然的人，现在则是他的弟子黄宝生。

首访中华大梦圆——夏斯特利先生的学术之旅

郁龙余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深圳大雨滂沱。四点多钟，天蕙来电话，说她和张婧已从香港机场返深，夏斯特利先生顺利、准时地于两点十分起飞。我一边感谢她俩，一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印度梵学宗师的首次访华获得了圆满成功。

自从我二月二十日访印归来，便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委托，积极筹备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收到夏斯特利先生来信，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可能会资助他访华，问我从气候等各方面看，何时访问最好。我说五月最好，您可以来参加泰戈尔研讨会。我知道他不是泰学专家，但考虑到他可以一路上得到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邵葆丽教授（Sabaree Mitra）等与会代表的照料，就极力鼓励他。我则做好了在北京迎接他的准备。五月六日下午，突然得到消息：因未办加急签证，夏斯特利先生不能赴京与会。到晚上，正在德里的朱璇来短信，说夏老刚刚拿到签证，八日下午三点多到北京。看来，他是办了特别加急签证。

五月七日，泰戈尔的纪念大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得盛大、热烈，获得圆满成功。五月八日下午，我和高兴（Binod Sinh）到首都机场接他。左等右等，不见他出来，正在犯嘀咕，只见机场的地勤先生用轮椅推着他出来。是不是他病了？我有点担心。一见到我，他马上从轮椅上站起来，精神极好。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我把他和高兴送上出租车，自己就回候机楼等晚上回深圳的飞机。

按计划，对外友协接待他一天；九日到十九日，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十九日到二十二日，由深圳大学接待。

专门写一本《印度梵学在中国》

夏斯特利先生首访中国，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之旅。他带来了十多个讲座专题，在北京大学演讲四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一次，并且游览了故宫、长城、天坛等名胜古迹。通过王邦维、段晴教授的接待、介绍，中国现代梵文教育的历史、现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段晴教授送给他一本《梵文基础读本》（德国梵学家称之为《施坦茨勒》），是由季羨林译、段晴和范慕尤续补的梵文教科书。作为印度的梵文学家，多次访学德国，见到此书的中译本十分高兴。因为他非常知道这本再版了十九次的书的地位，译者季羨林是他仰慕的前辈学者，送书人又是季先生的嫡传弟子。段晴所赠《中国的梵文写本：2008北京藏学研讨会梵文论坛论文集》，让这位梵学名宿心跳不已。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私人梵文图书馆，专门收藏世界各

地的梵文资料。印度的风雅政要及世界著名梵文大家，为了查阅某个孤本，经常登门拜访。所以，凡是有名的大梵文学家，没有不认识他的。在收藏梵文典籍的过程中，不乏佳话。他说有一年，他的学生、泰国诗琳通公主请他参观自己的图书馆，在四万多藏书中有一本《梵越词典》。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竟让他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开口索讨。回德里一周后，他突然收到诗琳通公主寄来的《梵越词典》的复印本。这让他喜出望外，逢人便说这位公主如何善解人意。现在，他得到段晴教授的珍贵赠书，作为一位学问家兼藏书家的他，其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同样收获丰多。在和黄宝生的交谈中，他进一步了解到梵文在中国的现状。黄宝生送给他译著《摩诃婆罗多》（六卷）、《奥义书》、《薄伽梵歌》、《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以及新著《梵语文学读本》。这些当然不是黄宝生著译的全部，他的专著《印度古典诗学》以及译作《故事海选》、《佛本生故事选》等，可能手头已无书，所以都不在赠书之列。但是，所赠之书，已足以让这位梵文宗师刮目相看。他私底下说，印度设有梵文大奖，每年由总统颁给一位年纪 65 岁以上、有卓越贡献的外国梵文学家。他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将会郑重地把黄宝生推荐给全体委员，因为他觉得黄宝生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梵文学家之一。此事不管结果如何，但是已经说明中国的梵文研究成就，已经获得他由衷的高度评价。因行李太多，要我们帮他将北京赠书邮寄到德里，并嘱咐，一定要防压、防潮。可见他对这些赠书的珍视。

我不是梵文学者，所以没有赠书计划。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几位学生陪他参观深圳中心书城。在“深圳大学教师书籍专架”上，发现我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他一边看着英文目录，一边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忙说，这书我办公室有，可以送您一本。他说：和北京的书一起寄，还有那套印地语的《西游记》。

二十二日上午临行前，他拿出《印度梵学在世界》的打印稿，说：“原来他打算在中国收集到资料后，将《印度梵学在中国》这一章写好，就可以出版了。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这本书先出版，接下来专门写一本《印度梵学在中国》。”我们听了，都支持他新的想法。中国的资料太丰富了，足以支持他实现这个想法。

告别的时间到了。他将已经看了好几遍的相册从箱子里取出，说：“郁教授，您得给我签个名。”原来，黄蓉、林姮、林天蕙和张婧将北京及深圳的照片，精选后制成《夏斯特利先生访华相册》，我为这个相册写了一个短序，由林姮译成英文，一百多字：

《夏斯特利先生访华相册》序

2011 年 5 月 8 日至 22 日，印度著名梵文学家夏斯特利先生，在耄耋之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访华，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深圳大学。这开创了印度杰出梵学大师访华的先河，也是他漫长学术人生中的精彩一章。

为此，我们制成《夏斯特利先生访华相册》，记录他的伟大而光荣的中国之行。

郁龙余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On May 8th, 2011,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vited the famous Indian Sanskrit scholar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to China at his eighties.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have visited Peking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henzhen University. This is a big event, as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an Indian scholar to pay a visit to China. It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in his glorious life as well.

In order to memorize the precious event, we made this unique album named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s visit to China, recording the great and glorious visit of his trip to China.

Professor Yu Longyu

May 21, 2011

我一边接张婧递过来的笔，一边对夏斯特利说：“您真是一位大行家！”（āp to bahut usdāt hain）他哈哈大笑起了。

一位特别爱美的老人家

二十一日上午，安排夏斯特利先生参观深圳市容和中国最大的书店——深圳中心书城。我和黄蓉、林姮先到，等天蕙、张婧陪他和我们会合。快十一点了，还没见到就打电话问。原来，临上车时他发现衬衣上的一个纽扣掉了。于是，两位又陪他上楼回房间，帮他扣子缝上。听到这个插曲，不禁让我想起北京机场的一幕。我和高兴接到他，故人相见，分外亲热。我告诉他：这三号航站楼是新建的，有一个汉白玉半镂空雕九龙壁。我们是否在那里照张相留念？他听我一说，边答应边要打开行李箱。原来，他要找领带，他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仔细一瞧，他的一身行头每件都十分挺括，棕色的皮鞋也是锃光瓦亮。这是为有人行触足礼而准备的。果然，在二十日的演讲之后，好几位印度人——包括一位大学校长，向他行触足大礼。

演讲时，夏斯特利先生坚持站着讲，我怕他太累，几次请他坐下讲都无效。半个小时后，我再次请他坐下讲，他才坐了下来。后来，当他发现相册中只有坐着讲的照片时，希望能有一张站着讲的照片。我顿时为他的爱美与敬业的结合，而深受感动。

由于长期与印度学者交往，总是会收到一些印度礼品。在送礼观念上，中国人和印度人有所不同。中国人一方面讲“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一方面又讲象征意义和贵重程度的结合。印度人一般则重视礼品的象征意义。而夏斯特利先生和一般的印度人不同，他送礼强调美和意义的结合，为此可以不惜代价。这次，他送我一幅精美的布画，内容为《薄伽梵歌》中的一个经典画面：黑天神告诫和激励阿周那：

一旦正法衰落，

非法滋生蔓延。

此画的工艺和形制为中国所无，也是我见到的最精美的印度工艺品。他送给我妻子的布画《拉达和克里希那》，是印度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也是极为精美。收到这么精美而贵重的礼物，我深感隆情难却，应该礼尚往来。于是，以著名的天津杨柳青《百子图》手卷相赠。我告诉他：手卷是中国特有的绘画形式，应该是电影的雏型，两者之间过渡形式是连环画和幻灯片。他听后，深以为然。为了让他和印度读者知道赠送此画的缘由，我写一段说明文字，并请林姮译成英文：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印度著名梵文大师夏斯特利先生，由黄蓉、林姮、林天蕙、张婧等中国弟子陪同造访寒舍。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先生赠我经典艺术作品《拉达和克里希那》，我以此《百子图》手卷相赠，以祝夏斯特利家族子孙永昌。

On May 21th, 2011, the famous Indian Sanskrit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came to my house accompanied by some students named Huang Rong, Lin Heng, Lin Tianhui, and Zhang Jing. As an old saying goes, Isn't it a great pleasure to have a friend coming from afar?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gave me an embroidered picture of classic art, the "Radha and Krishna" which is very valuable. I present the "Hundreds of Sons" as a gift in return. I sincerely hope the family of Professor Satya Vrat Shastri will be as prosperous as the painting.

他说，他的私人图书馆增添了一件独特的藏品，他会随身携带而不能作为行李托运。我想，《百子图》所以如此深深地打动了他，因为这幅手卷也是美和意义的完美结合。

“印度的国宝季羨林”

夏斯特利先生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梵文学家，从四五岁就开始教他学梵文。十一岁时，他在著名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梵文诗集，轰动一时，被喻为神童。于是，学习、研究、讲学、著述，他在梵文中度过了一辈子。他到过德国、美国、日本、泰国等几十个国

家访问，一共获得七十五个奖项，其中包括 1999 年、2010 年两度荣获号称印度诺奖的印度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可以说，夏斯特利获奖无数，名闻天下。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遗憾，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不了解中国的梵文现况。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除印度以外的最大的梵文大国，出过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梵学大师。这样，到中国去自然而然成了他今生今世最大的梦想。这就是他在耄耋之年，不顾年老体弱而执意独身访华的精神动力。

然而，这位著名的印度梵学宗师，在中国却几乎无人知晓。我应该如何来介绍他呢？我借用了“苏州是东方水城威尼斯”的模式，告诉中国读者：夏斯特利是印度的国宝学者，是印度的季羡林。效果十分明显，所有人立刻对他充满敬意。二十日下午的讲演，吸引了校内外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翻译家何道宽教授和一位印度大学校长。

夏斯特利对季羡林充满敬意，说季先生访印时，他们曾见过面，相谈甚欢。这次，他在北京见到黄宝生、王邦维、段晴，是那么的亲切，犹如见到故人之后。夏斯特利和季羡林虽然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确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著名梵文学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两人都有丰富的藏书和艺术品；两人都长期做过系主任和校长；两人都获得过印度的最高荣誉奖——莲花奖。

然而，两人最大的相同之处，是都深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都重视中印友谊。

夏斯特利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在深大所作演讲《我的梵学人生》中说：中印自古是友好邻邦，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 1/3。我认为这两个友好的国度应该联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语言的隔阂等因素，两国人民不完全了解对方。在印度，梵文学家们对中国的梵文研究和学者知之甚少。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第三方得知的（例如别国媒体），这样就难免会失真。我此次访问中国，是印度第一位梵文学家到访，具有历史意义。回国后，会把我的体会写下来，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这个友好邻居。让更多印度人了解中国，从而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同样，中国的梵文研究越深就越能增加对印度的了解。梵文作为联系两国的纽带和沟通的桥梁，具有重大意义！

听了他的演讲，更坚定了我的一个观点：中国和印度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只要真正理解、掌握了，一定会从心里热爱中国和印度，热爱中印人民。他虽然是首次访华，但是凭着他的梵文造诣和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熟稔，凭着他的丰富阅历和敏锐眼光，他已经深深爱上中国和中国人民了，并且决定为中印友谊切切实实地做点儿什么。在参观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时，看到泰戈尔和谭云山一家的合影，看到季羡林题字的馆名，看到周总理访问国际大学的场景，他是那么的兴奋和赞赏。我认为，夏斯特利是泰戈尔、谭云山、季羡林之后，又一座中印友谊的金桥。

演讲结束后，他和章必功校长有一次愉快的会见。章校长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只是北京拥有梵文教学和研究是不够的。希望深圳大学在将来能创办梵文系和印地语系。这样南北呼应才能更好地促进语言文化的研究。我说：请夏斯特利先生担任梵文系名誉系主任。章校长说：那是当然。夏斯特利高兴地表示，十分愿意为此出力。

深大的校园之美，学子们的精神风貌，中心书城家长孩子集体阅读的场面，让夏斯特利感动不已。中国，深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太好了。

二十二日下午，天蕙和张婧护送他到香港机场，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不得不惜别的时候到了，这位印度老学者竟泪流不止，两位深大女孩更是泪如雨下，泪影中看着他坐上轮椅进入泰国皇家专用通道，去等候飞往曼谷的班机。

一代梵学宗师夏斯特利先生回去了，带着圆梦的完美，带着真诚的友谊。他带走的，还有我们的心。

印度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我校

3月28日下午，印度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一行四人访问我校，校党委书记江潭瑜、副校长阮双琛接待了代表团一行。

此次来访的印度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成员包括印度国大党人民院议员、议会煤炭及铁矿委员会常委维韦卡南德·加达姆，印度人民党人民院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希沃库马尔·乌达斯，印度联邦院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塔伦·维杰伊，印度国大党人民院议员、议会内务委员会委员哈姆杜拉·萨伊德。

江潭瑜对印度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建起来的城市，有30年的历史；深圳大学随着深圳的建立而建立，有27年的办学历史，是一所新的大学，也是一所随着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大学。深圳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拥有9个学科门类，25个学院，建立了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在校生3万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近2000人，其中包括来自印度的留学生。江潭瑜说，深圳大学较早开展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印度政界、文化界、艺术界等各方人士有比较多的交流。他特别介绍了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维韦卡南德·加达姆说，中印两国均是世界古老文明大国，自古重视对外交流。他介绍了印度正在实行的教育改革，特别提到，印度专门成立了教育专署，欢迎像深圳大学这样的外国学校到印度办学、开讲座。他对深圳大学早在六七年前就成立印度文化研究中心表示赞赏，希望通过各方交流，使两国在全球高速发展的环境中达到共赢。

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就中印两国教育发展、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发扬传统文化以及我校印度文化研究现状等与我校领导进行交流。

代表团一行还在阮双琛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深大校园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深大宣传部）

“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纪念泰戈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在京举行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和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孟加拉驻华大使孟什·法亚兹·艾哈麦德分别致词，高度评价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先生伟大的一生和他对世界文学与和平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来自国内外的 100 名文化艺术界人士参加了纪念大会，并就多个纪念主题展开研讨。我中心郁龙余教授和杨晓霞副教授参加此次会议，郁龙余教授发表了《泰戈尔与新文学》一文，此文还是 2011 年 2 月 18 日，郁教授应邀在加尔各答泰戈尔印度大学所发表的演讲。

此外，此次纪念大会还通过泰戈尔系列丛书展、诗词朗诵、歌舞表演等形式展示泰戈尔在文学、哲学、教育、艺术等多方面的成就。此次会议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加强了中印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正如苏杰生先生所说：“建立更强劲的中印关系时给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建者最好的献礼”。（黄蓉）

中印学者研讨“谭云山现象与 21 世纪中印文化交流”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谭云山现象与 21 世纪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副主任姜景奎教授，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教授，印度文化国际学院洛克什·钱德拉教授、莎士·芭拉教授、尼玛拉·沙尔马教授，印度国际大学校长拉杰特·坎塔·雷伊，尼赫鲁大学系主任邵葆丽教授、狄伯杰教授等专家学者。研讨会上，中印两国专家学者围绕“谭云山现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谭云山先生的贡献，中印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影响，谈到 21 世纪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等问题。我中心郁龙余教授在会上发言《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的创作与反响》，剧本的创作受到学者的一致认可和赞赏。

在如今中印友好交流的趋势下，此会议打造的自由学术交流平台，对发掘拥有“功比玄奘”、“德配鉴真”美誉的谭云山先生的遗产和资料，以及对继承和发扬两国的文明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黄蓉）

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侧记

郝龙余

中国印度学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今年2月6日，我和孟昭毅教授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的安排下，拜访著名印度学者洛克希·金德尔先生（Lokesh Chandra）。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印度国学双璧》，写的就是他和另一位著名梵文学家夏斯特利（Satya Vart Shastri）先生。5月份，夏斯特利先生应邀来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深圳大学，收获大，故事多。我又写了一篇《首访中华大梦圆——夏斯特利先生的学术之旅》。

没有想到，两个月后我在北京的“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上，竟见到了84岁高龄的金德尔先生。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会上我还见到了他的妻子——著名学者夏尔玛教授（Nirmala Sharma）。

这次论坛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主题是“谭云山现象与中印21世纪文化交流”。印度来了以金德尔为首的六位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六篇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论文：《谭云山教授——印中文化关系中的菩萨》（洛克希·金德尔）、《文明、中国学院与我的神：泰戈尔与谭云山》（印度国际大学校长拉杰特·坎塔·雷伊）、《一位学者眼中的谭云山教授》（印度文化国际学院教授莎士·芭拉）、《发掘谭云山教授的文化遗产》（印度文化国际学院教授尼玛拉·夏尔玛）、《谭云山与泰戈尔之间的互动——印中文化共生之旅》（尼赫鲁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邵葆丽）、《谭云山与印中文明对话》（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授狄伯杰）。听了六位印度学者的发言，使我对印度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语言有了深刻的了解。先不论十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仅就这六篇印度学者的发言而论，这次论坛是高质量、高水平的，非常成功。

与会的六位印度学者，其中四位是我二月份访印时接待我的东道主，现在北京见面，分外亲切。关于夏尔玛教授，还有一段戏剧性的小故事。

2月6日拜访金德尔教授时，夫人夏尔玛不在家。访问结束，在花园里照相时，她从外面赶回来了。一阵互相问候之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回到深大后，和印度驻广州总领馆奈尔领事来信商议今年ICCR派到深大来的讲席教授的人选。于是，我翻阅她送给我的两本大著：《鸠摩罗什》和《巴米扬：诃梨帝母及相关造像》，认真阅读作者简介。这不正是我们要请的讲席教授吗？于是，我给奈尔领事写信，并附去了关于她的材料。

一切顺利，ICCR同意推荐夏尔玛教授，她为了来华，对自己的工作计划作了调整。章必功校长很快签署了邀请函。为了抓紧时间，我将邀请函用EMAIL先发给了奈尔领事和夏尔玛本人。邀请函原件由我带到北京，想请暑假回德里的北大博士生高兴（Binod Singh）送去。因为2月6日，他是和我们一起拜访金德尔教授和夏尔玛教授的。7月9日晚，高兴来北外酒店看我。他一如既往，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不过，为了赶博士论文，他回家要晚一些日子。我告诉他，尼赫鲁大学的邵葆丽教授也来开会，你们两人中，谁最方便，就请谁帮我送

邀请函。

7月10日傍晚，我在长白山国际酒店见到邵葆丽教授，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三次见面，上一次是在5月7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召开的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向她一说送邀请函之事，她笑道：你可以当面送给她，她和金德尔先生都来了。我听了又惊又喜。第二天，在会上他们见到我，更是大为吃惊。因为我们一直在网上有联系，就是都没有说起将出席同一个会议。当我将深圳大学的邀请函送到她手上时，她高兴得合不拢嘴。中印学者之间，竟是这么近，这么方便。在古代，中印交通千难万险，法显渡尽鲸波万里才到达印度，玄奘走陆路，更是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西天真经回到大唐。即使在上个世纪，谭云山往返于中印之间，乘船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如今，一切是那么方便快捷，真是今非昔比，世界的确变成了地球村。

抚今追昔，让人感慨万千。遥想法显、玄奘、谭云山等先贤，为中印文化交流而不辞艰险，令人高山仰之，钦佩不已。当下，天堑变通途，我们不应加倍努力，为中印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吗！

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组签约

2011年7月10日，我校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赴京出席“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工作会议暨国外智库座谈会”。会议由“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项目管理办公室召开。会上，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向郁龙余教授颁发了《“国外智库及对华文化政策研究数据库”印度部分》子项目立项书。郁龙余教授应邀以“智库”负责人代表身份发表讲话，受到全体与会者欢迎。

据项目首席专家张西平教授介绍，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资助资金为400万，是国家社科基金开设以来最大项目。

近日，经与印度研究中心有关人员和校社会科学部领导商议，郁龙余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项目组签订了“国外智库及对华文化政策研究数据库：印度部分”的子项目立项合同书。

郁龙余教授认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获此立项，对于深大的印度研究，是一个巨大鞭策，为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印度研究机构，必须将该项目纳入中心的整体发展规划之中，切实认真履行合同，做到完成项目与日常研究、教学工作统筹协调，互相促进。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访问印度专栏】

【编者按】2011年2月5日至20日，郁龙余教授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高尔（Suresh Goel）主任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5天的学术访问，在ICCR的精心安排和德里、孟买、加尔各答三地接待官员的热情接待下，此次访问获得圆满成功。此次访印的主题，是文化学术交流。郁教授拜访了诸多杰出的专家学者，访问了十多个高校，做了多场讲座，还与印度诸多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等雅聚一堂，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中国政府的文学政策、鲁迅评价、毛泽东评价、孔子学说评价，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等问题。回国后，郁教授有感而发，记下天竺之行的点滴心情。本刊选登《访问印度报告》和几篇有浓厚印度风情的文章以飨读者。

访问印度报告

郁龙余

2011年2月5日至20日，我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高尔（Suresh KGoel）主任的邀请访问印度。同行的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校“杰出贡献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著名东方文学专家孟昭毅教授。在德里期间，北京大学两位博士生高兴（Binod Sinh）和朱璇随行，朱璇（深圳大学2009届硕士毕业生）则全程陪同。在ICCR的精心安排和德里、孟买、加尔各答三地接待官员的热情接待下，此次访问获得圆满成功。

（一）行程简叙

2月5日晚

我和孟昭毅教授同机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ICCR接待官员库玛尔（Rakesh Kumar）先生和高兴到机场迎接。入住阿育王饭店（The Ashok Hotel）。

2月6日

拜访印度国宝级学者、杰出印度学家洛克希·金德尔（Lokesh Chandra）和杰出梵文学家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Satya Vrat Shastri）教授。受益良多。

晚7点，尼赫鲁大学教授、著名中国学家墨普德（Priyadarsi Mukerji）教授（2008.10—2009.1受ICCR派遣为深圳大学讲席教授）设家宴招待我和孟教授，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班浩然先生（Gautam Bambawale）偕夫人出席。

2月7日

原计划11:00—11:45会见ICCR主席凯伦·辛格博士（Dr. Karan Singh），因索尼娅·甘

地主席临时有事与其商议，未能与我会见。ICCR 官员说，会相机安排。

一行四人到外交部拜访班浩然司长。班先生与他的两位助手和我们见面，相谈甚欢。中午，班先生设宴招待，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先生偕夫人陈望夏女士及外交部联合秘书、ICCR 副主任约格西瓦·瓦尔玛（Yogeshwar Varma）以及尼大中文系主任邵葆丽（Sabaree Mitra）等出席。

下午，访问 Jamia Milia Islamia（J·M·I）伊斯兰大学，会见维娜·希克利（Veena Sikri）教授，并和该校师生举行圆桌会议。

2 月 8 日

访问尼赫鲁大学，向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系师生发表演讲，题为《中国文化的要义与形态》。系主任邵葆丽教授主持。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马尼克、墨普德、狄伯杰等出席。

中午，邵葆丽教授设中国餐宴请。

下午，与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系师生座谈，该系创始人雷易（Haraprasad Ray）、孟教授和我主讲，狄伯杰主持，内容为中印文化交流及共同基础。

2 月 9 日

赴阿格拉泰姬陵观光，参观阿格拉堡。

2 月 10 日

会见著名泰戈尔研究专家普雷耶格·苏克勒（Prayag Skukla）教授。他是一位有着国际声誉的著名诗人、作家和翻译家。2011 年，为纪念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他出版了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孟加拉语、英语和印地语的三语合璧对照本。

中午，ICCR 主任高尔先生设宴招待。著名学者夏斯特利、J·M·I 大学维娜·希克利教授及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邵葆丽、印地文系主任 Purushottam Agrawal（兼任国家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国家博物馆研究所所长等出席。

下午，访问德里大学，会见东亚系主任、中文教授马图·帕拉（Madhu Bhalla）等，向中文专业师生发表演讲并座谈，内容为印度文学在中国、中印经典翻译、如何从印地语教师成为中文教授等。

傍晚，访问著名印地语诗人、作家阿啸客·吉克尔特（Ashok Chakradhar）。他倾全家诗艺之才热情接待。我们尽兴而归。

2 月 11 日

德里市容观光（新老两座印度教庙），拜谒甘地墓。

下午，将印度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主席、辛格总理、帕蒂尔总统和拉奥琦大使（现为外交秘书，Foreign Secretary, 相当于常务副部长）的 4000 元《深圳大学学报》稿费代捐给比哈邦一民办小学，由其校长签收。

傍晚，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普拉萨德（H.S.Prasad）夫妇来饭店谈经典翻译。德里大学东亚系教授谈玉妮 Ravni Thakur 来酒店话别。

2 月 12 日

上午，离开德里乘飞机抵孟买，入住特利登饭店（Hotel Trident）

下午，访问尼赫鲁中心，观看短片和展览《印度的发现》，并与中心负责人进行座谈。
傍晚，会见法国著名印度学家兼企业家鲍思岱（Poste）、朱新天夫妇。

2月13日

乘船参观象岛湿婆神庙。

2月14日

上午，访问索菲娅女子学院，会见尼玛拉·特利帕蒂(Nimala Tripathi)教授，并向印地语系师生作印地语演讲，讲题为《中国的印度学研究》。

下午，会见达式图(H.N Dastur)教授，参观印度学术研究院（Bharatiya Vidya Bhavan）并发表演讲《印度学在中国》。

晚上，观赏俄罗斯音乐会（鲍思岱、朱新天夫妇招待）

2月15日

上午，自由活动。

下午，访问孟买大学，会见梵文系主任高丽·玛福利克（Gauri Mahulikar）教授，并向梵文系师生和其他相关人士作演讲，讲题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

2月16日

上午，赴中国驻孟买总领馆拜访总领事牛清报先生。

离开孟买乘飞机赴加尔各答，入住印度斯坦国际饭店（Hotel Hindustan International）

2月17日

访问捷台伍坡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发表演讲《中国与印度的史地文化与文学》并会见该校副校长高希教授（Pradip Narayan Ghosh）。

访问 Maulana Azad 亚洲学会（Maulana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并用午餐。

访问印度文学院（Sahitya Academy），会见著名学者摩炯达（Swapan Majumdar），与加尔各答众多著名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座谈。

2月18日

参观泰戈尔博物馆（泰戈尔出生地）

访问泰戈尔印度大学，发表演讲《泰戈尔与中国新文学》

访问加尔各答大学，发表印地语演讲《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

2月19日

乘车离开加尔各答赴圣地尼克坦（和平乡），入住酒店。

参观泰戈尔国际大学博物馆、中国学院、艺术学院。回酒店途中参观乡村艺术赶集，大饱眼福与耳福。

2月20日

乘车赴加尔各答机场飞往德里机场，在阿育王饭店稍作停留即赴德里机场。

途中，拜访 ICCR 副主席史耶德·夏希德·马赫迪（Syed Shahid Mahdi），他代表凯伦·辛格主席，向我和孟昭毅教授道别。谈及中印友谊，中印典籍翻译，在难得的春雨之夜畅谈。

晚 11 时，告别 ICCR 陪同官员，登机返国。

（二）主要收获

这次访印，安排之精心，服务之周到，接待规格之高，实属始料未及。同时，我们也全力以赴，倾情投入，凡是讲演、座谈、交流，有求必应。

1、成功举行多次演讲、座谈、交流

各种演讲座谈中，在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索菲娅女子学院、孟买大学、捷台伍坡大学、泰戈尔印度大学、加尔各答大学的演讲，最为重要。演讲一般以中文、印地语交互使用方式进行，用中文讲述时，由高兴和朱璇译成英语。在索菲娅女子学院印地语系的讲演，则全用印地语；在加尔各答大学的演讲，因与会师生表示都听得懂印地语，也用印地语演讲。从效果上看，演讲的内容和方式是好的，印度听讲者不但现场反应热烈，而且说：“您不仅仅是用脑来演讲，而且是用心来演讲。”

在座谈交流中，在诗人阿啸客家以及和加尔各答作家与艺术家、ICCR 副主席马赫迪的交谈，最为重要。

阿啸客，是印度负有盛名的当红诗人和作家，并兼有多种社会职务，全家都有艺术才华，人人参与接待。我和诗人谈及印度印地语诗和英语诗的鉴赏。他播放了女儿得奖的古典舞蹈作品，签赠两部诗集，并即兴赋成藏名诗一首相送。

加尔各答是印度文化艺术名城，数十位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雅聚一堂，与我们相见座谈。在我主题发言之后，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诸如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中国政府对文学的态度和做法、鲁迅评价、毛泽东评价、孔子学说评价，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等等。我主答，孟昭毅教授配合，谈笑风生，张弛有度，主客皆大欢喜。

马赫迪是 ICCR 的副主席，曾任一所大学的副校长，是著名的乌尔都语学者。他为这次接待做好充分准备。交谈中，家人端出奶茶和几样小食品，其中之一叫“白糕丽”（Pakauri）。他说：刚炸好，是雨天食用的佳品。我问：是否我们来了，天就下雨了？他笑道：是的，天知道你们要回德里，就下了难得的春雨，我就炸“白糕丽”招待你们。他说，中国文化很伟大，我非常喜爱。说着回书房取出《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英文版，并表示愿将中国文学名著译成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临别，他取出两条围巾，围在我和孟昭毅教授的脖子上，深情地说，如果我太太在，应当由她给你们围上。她过世了，只得由我来给你们围上。他将我们送出家门，依依惜别。

2、结识了一批印度当代学术精英

此次访印，在中印当代文化学术交流史上可遇而不可求。以中国文化为魅力，中印文化交流为动力，在互相欣赏中相知相交。我们结交的印度当代学术文化精英，都是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是“国之重器”，名闻天下。结交相识的校长、系主任、研究中心主任、项目负责人达数十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以前认识的老朋友，如尼赫鲁大学的邵葆丽、墨普德、狄伯杰，德里大学的谈玉妮，等等，大多数是这次新认识的，如著名印度学家洛克希·金德尔、著名梵文学家夏斯特利先生。在当代印度，这二位是国之瑰宝，极负盛名。

金德尔教授，做过十二年国会议员（1974—1986），既是一位卓越的印度学家，又是一位资深的佛学家。早在 1954 年，他就用出版了由拉祐·维拉教授梵语和英语翻译的《诗与画：中国不害思想》一书，图文并茂，至为珍贵。2010 年，他又出版了《佛陀高贵的一生》，是研究中国明版佛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的专著。他表示，愿为中印文化交流多作贡献。

夏斯特利教授，曾任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和 Shri Jagannath 梵文大学校长和尼赫鲁大学荣誉梵文教授，是印度著名的梵文学家，备受尊崇，获国内国际大奖无数，印度前总统 A·P·J 阿布杜尔格拉姆和现任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都给他颁过大奖。他谦逊平和，有伏枥之志，主动提出要将中国的《诗经》译成梵文和印地文。2 月 10 日 ICCR 高尔主任宴请，他欣然告诉我，他已将翻译《诗经》一事告诉高尔先生，ICCR 大力支持。

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及学校研究董事会主席普拉萨德，是当代印度著名哲学家。因朱璇在其门下修博士课程，得知我的行程与计划，便偕夫人到饭店来商议翻译《周易》一事，态度坚定而诚恳。其人英俊潇洒，其妻俊美秀丽，一句印度最佳郎才女貌，把他们乐得合不拢嘴。凡听说普拉萨德先生将译《周易》的人，都说他是极佳人选。

尼赫鲁大学的罗易教授，是中文系的创始人，一位可敬的中国学前辈。我受《深圳大学学报》委托，给他送去 660 元稿费，他十分高兴。在我演讲前，他就在会场里预热，幽默地说：谁说学中文没有钱，我刚才就领到了人民币 660 元，合卢比 4000 多元。好好学中文吧。作为一位退休老教授，他依然关心印度的中文事业。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对鲁迅、茅盾等有专门研究，对中印文化交流、印度的中国学，等等，有长期积累，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中国学者尤其是治现代中印文学交流史者，应向其虚心请教。

其他精英学者，各怀宝器，不再一一列述。

3、获得了众多重要的科研项目

此次访印，发现许多领域我们的研究还一片空白，许多重要项目的研究刚刚开始，许多印度学者有着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的强烈意愿。以下项目，应是我们今后合作的重点：

A、编写《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

温家宝总理 2010 年 12 月访印，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共同宣布 2011 是中印交流年，并在《联合公报》中指出：一致同意商讨编写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印度外交部和尼赫鲁大学很重视，指定由中文系主任邵葆丽教授筹组印方编写委员会，并希望由我和邵教授合作，筹组中方编写委员会。目前，我们正与中国有关方面联系，落实具体任务。以便尽快开展《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

B、中国印度经典翻译项目

赴印之前，我们拟成《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草案，在印度所受欢迎的热烈程度，大大出乎意料。目前，初步确定的中国经典和翻译者的情况如下：

经典	译者	所译语言	译者身份
《诗经》	夏斯特利	梵语，印地语	杰出学者
《周易》	普拉萨德	印地语	德大哲学系主任
《道德经》	舒明经	印地语	讲席教授

《论语》	邵葆丽	印地语	尼大中文系主任
《庄子》	墨普德	印地语，孟加拉语	讲席教授
《墨子》	墨普德	印地语，孟加拉语	讲席教授
《楚辞》	阿格拉瓦	印地语	尼大印地语系主任
《唐诗三百首》	玛福丽克	梵语，印地语	孟买大学梵文系主任
《红楼梦》	马赫迪	乌尔都语	著名学者

拟将印度经典译成中文出版的，主要有：

《梨俱吠陀》(Rgveda)

《政事论》(Artha sāstrī)

《古拉尔箴言》鲁瓦尔著

《甘地全集》(Mahātmā Gāndhi kī Granthavali)

《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 重译

C、中国现代佛学名著印译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中国化。中国化了的佛教典籍，颇受印度学者和民众喜爱，上述的《诗与画：中国不害思想》、《佛陀高贵的一生》于1954年和2010年在印度出版，便是有力证明。另外，不久前召开的鸠摩罗什国际研讨会，不少印度学者有论文或专著发表，如N. Sharma的 *Bamiyan, Hariti and Kindred Iconics* (2011 出版) 和《鸠摩罗什》Kumarajiva (2011 年出版)，就大量引用中国佛教材料。星云大师诸多著作的英文译本，在印度传播甚广。为了让更多中下层民众受益，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决定将星云大师的著作译成印地语。ICCR的接待人员拉盖希先生，见到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负责人赠我的一册《星云大师语录》印地语译本，竟爱不释手，向我索取，我只能题字转赠。此事说明，中国现代高僧著作，译成印度语言出版，具有多方正面效用，有利于中印文化交流多样性格局的形成。

4、在交流中获得多种思想共识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成果，是和印度各方面人士在交流中所形成的思想共识，相辅相成的。这些思想共识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A. 文化学术交流是国家关系的重要课题

此次访印的主题，是文化学术交流，这也是印度各大学所希望的。他们热切希望了解中国，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基础性的话题，他们也非常感兴趣。这是缺乏交流造成的。在尼赫鲁大学的演讲，原来准备的讲题是《中国印度文化的共同基础》，后应尼大要求改成《中国文化的要义与形态》。由此可见，他们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在其他大学的讲题，也都紧紧围绕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有关联的，作适当联系和比较。这样，就较好地满足了对方的需求。在演讲中，用印地语作适当解释，听者觉得很入耳。应他们要求，有两次用印地语演讲，效果之好，出乎想象，因为满足了他们真切感受和认知中国文化的愿望。有多个场合，印度朋友畅叙中印友谊，喊出“中印是兄弟”的口号，一切出乎意料，一

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通过这次访印，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学术交流是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课题。我为此做了点工作，所以受到欢迎，被称为“民间大使”。

B.文化交流是多层次的，不可偏废

在访印过程中，感到日本、韩国在不少方面做得很到位，值得我们学习。如建在泰戈尔出生地的博物馆，主要是日本展室和展品，中国展室阙如而且图片也极少，亟需加强。（据悉，文化部已有方案）中国的文艺表演开展较好，获得很高评价。

经典互译，是此访的热点话题。印度学者对翻译中国经典的积极性极高，是出于这样的共识：中印两国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高速发展，但传统文化经典，依然是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准则。华梵心相知，互读经典始。印度学者还对中国经典至今没有可靠的印度语言译本，深感遗憾。表示要努力改变“中国译印度经典一屋子，印度译中国经典不满一箱子”的状况。与此同时，印度有学者还表示，除了译中国古代经典之外，还毛遂自荐要译文学名著，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C. 加强信息沟通，拓展交流渠道

印度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生，有迫切学好中文的愿望。但是，目前互相交流的渠道还不够多，不能满足各类留学生互派的需要。所有已开中文专业的大学都缺乏有资历的中国教师，许多大学都想开设中文专业，犯愁的是没有师资。德里大学想设中文硕士专业，也愁没有中国教授。我驻孟买总领事牛清报先生说：如果有中国教授来印度讲中国哲学，一定大受欢迎。

在目前情况下，展开校间合作，帮助印度高校充实、加强中文师资，开设中文专业，是适时之举。同样，中国高校的各印度语言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也需要印度师资的大力支持。

中印合作编写语言教材，也是一大合作领域。目前，有的印度大学采用西方国家的汉语教材，觉得十分无奈。

加强信息沟通，拓展交流渠道，是此次访印听到的最大呼声和切身感受。

（三） 若干体会

此次访印，虽然只有半个月，但行程不短，接触单位和人群不少，且与印度一流学者和学术精英作了较深入的交流，和一般阶层也有接触，体会感触良多。

1. 印度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

和我 1993 年访问印度相比，当下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德里机场宏大，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结合的杰作。孟买附近新工地、新楼盘随处可见，加尔各答四周以及到圣地尼克坦的沿线，在建厂房、楼宇众多，公路上载货车辆成群结队，让人感到印度经济的脉动。因时间关系，此次未能到南方访问。但普遍认为，孟买、加尔各答经济好于德里（德里满街三轮出租车，孟城、加城则满街的士）。同时，大家又都认为，印度南方经济好于北方。有人说，当下的印度好像十年前的中国。总之，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未出现民工荒问题，发展潜力巨大。印度人的骄傲和幸福感，不缺乏理由。

2. 贫富依然悬殊，但社会总体和谐

贫富悬殊，是印度的历史性问题。当下印度仍然如此。贫民窟依然连片且遍布城市各处，乞讨者也常常叩击我们的车窗。但是，印度社会总体和谐，贫富差别悬殊并未造成社会不稳。这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作用，历来如此，祖祖辈辈如此，不指望有什么救世主能在哪个早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宗教的教化作用，前世今生的果报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时时起作用；富人不张狂，比较体恤信任穷人，良好的雇佣依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沟通、缓和了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印度人比较安贫乐道，满足于现状，也不像中国人那样拼搏、追求物质享受；经济的发展，给整个印度社会带来希望，带来了安稳。

3. 恐怖主义阴影随处可见

对当下印度最大的威胁，不是别的，是恐怖主义。自 2008 年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全印度加强了措施。我们所到之处，政府机关，酒店、机场、宗教场所、重要人物的寓所，甚至一些具有政治性的街头雕塑，都有荷枪实弹士兵守卫，许多场合，配有女兵。戒备森严，安检严格，但态度和蔼。总体而言，印度社会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4. 经典翻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

由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的不同，中外关系显示出不同特点。中印现代关系，因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存在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双方对经典意义的认识，都相当深刻，具有共同语言。继续和发展这种经典翻译的传统，是中印现代国家关系，尤其是文化交流的特色课题，不但重要，而且长效、可持续发展而无副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优势所在。

鲁迅说：“（中国）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赐，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是说印度人不专美，将文化瑰宝送给了中国，中国文化几千年长青不衰，与中印文化交流，从印度文化中吸取营养紧密相关。我们也要奉行送美主义，将中国文化中美好的东西送到印度去。作为回报，作为答谢，和印度学者一起切磋交流合译中国经典，与之同美共享，何乐而不为。

泰姬陵断想

郁龙余

2月9日，清晨6时我们从阿育王饭店出发，驱车去参观泰姬陵。

一路上，天高云淡，美景扑面。印度的男子，衣着朴素，有传统服装，也有现代的西式服装；女子则一律传统服装，身穿纱丽，头上，项上，臂上，腕上，手指上，都戴满了饰品；脚趾甲上，只要愿意，不论年纪，都涂得红红的。“印度女子，是美的主人。”此话一点也不错。从附近的村庄里，突然走出几个女子，可能拿着农具，牵着牲口，也可能头顶着柴草，但准保一律盛装打扮，和过节时没有什么区别，她们没有“工作服”的概念。不过，印度朋

友告诉我，她们过节时的打扮，要比平时讲究十倍。

一路上，我们看着车窗外迷人的景色。一见到特别景观，我就告诉身旁的孟昭毅教授。这次印度之行才让我知晓，他不仅是著名学者，而且是著名拍客。当然，这些“特别景观”中，少不了一群群身穿纱丽的印度女子。

三个多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世界闻名的泰姬陵。她被誉为“地上的月亮”、“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几十年来，她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是因为，我平生第一篇文章就是《泰姬陵》，发表在1982年的《北京大学》校刊上。文章很短，不足千字，但是有一个硬伤，说沙佳·汗的宠妃泰姬死后葬在巨大的圆形穹顶里。看资料多了，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这次亲临泰姬陵，发现自己犯的是一个低级错误。泰姬的石棺安放在寝宫正中的大理石石床中央；被儿子囚禁、郁郁而死的沙佳·汗的石棺，则安放在泰姬石棺的左侧。这种不合礼制的葬法，是当时政局的产物，但同时也是旷世大爱的见证。

泰姬陵的参观者，人山人海，用中国英语来说，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和其他景点一样，外国人的门票是印度人的十倍。这让我想起了日本。在日本，最好的产品留在国内销售，乘飞机日本人先登机。十倍的门票并不算贵，但从这国民待遇中折射出印度的国民心理。印度人不差这点钱，但是就这么做了，你咋想就咋想。印度人不在乎外国人说三道四，这一点让我挺佩服。

名不虚传，一走近泰姬陵，就被她的宏伟、壮丽所倾倒。走进六七十米高的大理石的中央寝宫，立刻为她的气宇轩昂而折服，为她的精致巧妙而惊叹。阅遍世界建筑，在大理石宫殿营造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她是建筑的艺术体现，是力和美的高度统一，是传统石头建筑的顶峰和绝唱。我忽生断想：自泰姬陵之后，人类建筑不得不另辟蹊径，走钢筋水泥的路子。

因行程紧张，原来没有参观泰姬陵的计划，是东亚司班浩然司长（**Gautan Bambawale**）先生一再建议的结果。参观完泰姬陵之后，我们在心里愈发感谢他。

2011年3月5日

辛赫校长

郁龙余

辛赫先生是印度的一位民办小学校长，全名叫格墨雷西瓦尔·辛赫（**Kamalesvara Sinh**）。辛赫在印度是一个大姓，原义是狮子、英雄，在历史上，这个姓氏的确出过许多英雄人物。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篇著名小说《辛赫元帅》，刻画的就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我见到的辛赫先生，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朴素，扎着一条布头巾，一位典型的乡村秀才。听说他是乘慢车到德里的。这种慢车的票价十分便宜，只是时间没有保障，要让一切车辆先过。也许是来德里的车特别多，几百公里的路，竟走了二十多个小时。不过，辛赫

校长一脸喜气，一身精神，没有丝毫疲惫的样子。

我和辛赫校长素昧平生，是一笔捐款把他和我联系在了一起。在 2011 年 1 月 13 日，我给我的朋友、北京大学博士生高兴（Binod Sinh）写了一封信，请他帮我一个忙。信中说：

离 1 月 17 日你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知你家在德里市中心吗？我想请你帮助办一件事，不知是否方便？

2007 年 10 月 27 日，印度国大党主席、执政联盟主席索尼娅·甘地夫人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和谐》的演讲。得到拉奥琦大使授权，我们将演讲稿刊载在《深圳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上。2008 年 1 月 15 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题为《21 世纪的印度与中国》的演讲。我应邀出席，有临兰圃之感。得到拉奥琦大使授权，我们将这一篇演讲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上。2008 年 6 月 18 日，拉奥琦(Nirupama Rao)访问深圳大学，并发表了题为《中国印度关系展望》的演讲。演讲稿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上。当年 10 月，我和北大两位印度学专业的博士生刘朝华和李美敏去大使馆拜访她。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边谈边用印度点心和奶茶，拍了不少合影。至今印象深刻。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当我将深大学报编辑部支付的 3000 元人民币交给她时，她婉拒了。她说：我是国家公务员，除了国家发的薪水之外，不该有别的收入。到深圳大学演讲，是我的工作。请替我谢谢深圳大学。我说，这里还有索尼娅·甘地夫人和辛格总理的稿费，请您代转。拉奥琦大使说，他们和我一样，也不会收。”她语气温和而坚决，我心中十分感动，在感动中产生了很多亲切的敬意。

回到深大后，我就将钱退给学报编辑部。但是，在财务手续上无法退回，要我另想办法。我一直在想，但总是想不出好办法。

2010 年第 6 期《深圳大学学报》，在苏杰生（Dr. S. Jaishankar）大使的同意下，刊载了印度普拉蒂巴·帕蒂尔总统 5 月访问华时的 5 篇讲话、致辞和一篇祝词，编辑部又让我签收了 1000 元稿费。我知道，拉奥琦大使不收稿费，帕蒂尔总统就更不会收了。但是，作为学报发表文章付给稿费，是天经地义的，我不得不代收。收了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

昨天，ICCR 派来的讲席教授舒明经（Dr. Shubhra Tripathi）到我办公室谈事。我问她，可否将这笔钱捐给印度的一个慈善机构？她说，非常好，她可帮我找一个有信誉的官方机构。今天，广州总领馆来传真，安排我在 2 月 5 日到 20 日访问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不到舒明经教授的家乡中印度。这样，我想请你帮我在德里找一家慈善机构，把索尼娅·甘地夫人、辛格总理、拉奥琦大使和普拉蒂巴·帕蒂尔总统的稿费捐给他们。这笔钱一共是 4000 元人民币，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可以将她们的廉洁精神变成博大爱心，鼓舞和温暖更多的人。我想，这也许是我处理这笔钱的最好的方法，请你支持我，帮我实现这个想法。

等我到了德里，高兴告诉我：找到了一所民办小学，他们决定委托校长来领这笔捐款，用来建一间“中印友谊课堂”。

为了表示郑重，辛赫校长带来了这所小学所有学生的考勤登记、全体老师的签名和许多照片。他还带来了一封申请信，上面有两位乡议会（长老会）负责人的签章，支持向该校捐款。这封申请信，用纯粹地道的印地语写成，文笔优美。信的标题是：为建造“中印友谊课

堂”向 R.C.S 民办小学捐赠人民币 4000 元（合印度卢比 28000 元），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荣幸地告诉您，在比哈尔邦柏克斯地区的和平乡，有一所名叫 R. C. S 民办小学的教育机构，是一所模范学校。就读的全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共有 547 名。学校有 9 名男老师，4 名女老师，都悉心投入教学工作。

学校因为缺少教室，不少孩子只能在树下学习。为了孩子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美好前程，我们请求向他们捐款。学校和学生家庭将永远铭记您的恩德。

信的落款是：您可信赖的 R.C.S 民办小学及学生家庭。

读完这封信，我对面前的这位辛赫校长充满敬意。于是，我拿起笔在信的左下方，用中文写道：“同意将索尼娅·甘地夫人、曼莫汉·辛格总理、拉奥琦大使、帕蒂尔总统的肆千元（4000）稿费代捐给该校。详见给高兴的信。”然后，在孟昭毅教授和高兴的见证下，将 4000 元人民币郑重交给了辛赫校长。他接过钱，在信的左上方用英文签收：我从郁龙余教授处收到捐款 4000 元人民币，于新德里阿育王饭店。2011 年 2 月 10 日。

我告诉辛赫校长，这笔钱是代捐。今后，我们会想办法继续向学校捐赠。他一再表示感谢，说一定用好这笔捐款。

我回到深圳后，经常会想起辛赫校长，想起我对他说过的话。

2011 年 3 月 16 日

印度女神的项链

郁龙余

孟买，是我印度之行的第二站。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安排我住在著名的特立登（TRIDENT）酒店。这家酒店地处孟买黄金地段，以其无敌海景闻名遐迩。ICCR 孟买工作站的马力克先生，陪我办理入住手续。一位长得像范伟似的先生和一位酷似姚晨的小姐，热情接待了我。这位印度范伟一边将房卡交给我，一边对我说，安排您住 2101 房间，那里看海景非常美。

酒店和海，只有一路之隔。坐在房间的窗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油然而生。而此处海景之美，美在夜晚。酒店前的滨海大道，宛如一串的项链，在夜色中璀璨夺目。

来到印度，一直为色彩所感动。印度人特别是女子对色彩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不论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偏僻的小山村，所有女子都将纱丽的色彩搭配得美妙无比。这是一个数亿人的庞大女性群体，以自己的纱丽集体抵抗现代化带来的单一与似是而非。怎么不令人感动。看到眼前这条夜色中的滨海大道，我又不禁被孟买的色彩工程师所感动：一般的灯柱顶端有四盏灯，有的是三盏灯，发出黄玉般的柔光；每根灯柱一人多高的地方，都装着长方形的广告灯箱，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辉；每当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之时，汽车的红色尾

灯，又像无数的红宝石闪闪发光。整条滨海大道，宛如一串无尽的镶有黄玉、蓝宝石和红宝石的熠熠生辉的项链。夜幕中的海湾，则像一块硕大无比的墨绿色的丝绒。天造地设，鬼斧神工。

关于孟买滨海街景，业师季羨林先生在散文《孟买，历史的见证》中写道：“我们到孟买的时候正逢上印度最大的节日点灯节。记得有一天晚上，孟买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邀请我们共同欢度节日。我们走进了一座大院子。曲径两旁，草地边上都点满了灯烛，弯弯曲曲的两排，让我立刻想到沿着孟买弧形海岸的那两排电灯，那叫做‘公主项链’的著名的奇景。”夜幕中孟买的滨海大道，季羨林先生说是“公主的项链”。有人说是英国女王的项链。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条巧夺天工、美不胜收的项链，只有一位主人才有资格佩戴，那就是印度女神。Mumbai 本来就是一位印度女神的名字，这条项链理所当然，属于这位名叫孟买的印度女神。

让我们双手合十，向这位印度女神致敬。

2011年2月15日

【谭云山文献专栏】

中国与印度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广播词）

同胞们，同志们：

今晚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叫我来这里广播，讲一讲我们中国与印度两个伟大兄弟国家中间的深厚友谊与文化关系，我很高兴。

我们知道，中国与印度，不但是世界上两个文明最古老优秀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最悠长久远的国家。打个比喻：我们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就好像我们两个国家中间的喜马拉雅山一样。从古至今，任你风吹雨打，雪飘冰冻；我们决不动摇，绝不颓废。而且风越大，雨越狂；我们的抗拒力量，也越勇越猛。雪越深，冻越厚；我们的生存力量，也越强越坚。可以说：有喜马拉雅山存在的一天，就有我们中印两国和人民生存的一天。所

以中国与印度，真是如我们的古书所说：『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的国家。因此我们中印两国和人民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责任与使命，也非常重大。

讲到中国与印度两国人民中间的交往友谊和文化历史关系，更是世界上最特殊，最和好，最密切，而为任何其他两人民中间所罕有的。

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中间的交往友谊，据中国的许多古书如周书记异、历代佛祖通载、佛祖统记等所载，是远在周朝末或秦朝便开始了的。在印度方面，也有不少的古书如史诗摩诃婆罗拖等，提到古代中国的人民和事物。更有一种传说，说在二千五六百年前释迦牟尼佛幼时所读的书籍，便有一部讲中国的书在内，但这些古书记载和传说的时间正确性，还要详细研究和考证。然而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友谊历史的古老悠远，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般中外学者，都普遍地承认一件关于中印两国交往友谊文化关系的重大事件，就是一般所传说的『后汉明帝迎佛入中国』的故事。现今洛阳城东，有一个白马寺，便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欢迎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中国传教而建造的。这一事件，便是印度佛教正式传布中国的开始，也便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友谊与文化关系的正式历史记载的开始；同时也就证明了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友谊的历史古老悠远的事实。

自印度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后，中印两国人民的交往友谊与文化关系，便一天一天地更加密切了，一面是中国的大德高僧如晋法显、唐玄奘等，络绎不绝的往印度朝圣求法；一面是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如达摩祖师、鸠摩罗什等，继续不断的来中国访问传教。这些大德高僧，高僧大德，络绎不绝与继续不断的来往，或朝圣求法，或访问传教，既不是为名，又不是谋利，更不是侵略。他们的一片真心诚意，只是纯粹为了建立中印两国人民中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关系。他们都是把整个的生命贡献了给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来往交通，是万分艰难与困苦的。其艰难困苦的情形只要看了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可想像得到的。高僧传说有两句诗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这便是说，一百个人去求法，必有九十多个人要在途中牺牲了；能成功归来的，很难到十个人。由于这些高僧大德，大德高僧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与热情牺牲，便在中印两国人民中间，缔造了二千年来世界历史上所稀有的最特殊、最重大、最悠久、最和好、最密切伟大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

还有，中印两国人民之间，自有交往历史以来，经过时间二千年，国境相连数千里；不但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端和冲突，便连口角也都没有发生过，更说不到战争。由此可以说明；我们中印两个国家，是真真实实的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我们中印两国人民，是真真实实的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民。这一个极稀有宝贵的教训，是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人民学习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人民所应该学习的。

所不幸的，是晚近数百年来，西方的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打进东方。於是我们中印两国人民同被侵略，同受压迫，同遭剥削。而我们两国中间的伟大友谊，也被隔离。在这几百年中；我们中印两国人民所遭受的摧残与痛苦，真是数不清，说不尽。又幸而从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以来，中国有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印度有甘地先生和尼赫鲁总理等，出而倡导革命与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侵略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于是我们中印两国人民，又渐渐抬起了；而我们两国人民中间的伟大友谊关系，也渐

渐得到恢复的机会了。

至于现代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友谊恢复的开端，要以一九二四年印度诗圣兼师尊泰戈尔先生来到我国访问与讲学为起点。嗣后我自己於一九二八年，由南洋去到印度国际大学，一面研究，一面教授，并与泰翁朝夕相处。经过几年的深沉思考与亲身体念，更感觉到，不但中印两国过去的友谊与文化关系，有积极恢复之必要，同时还要开创新的友谊与新的文化关系。于是在泰师尊的感动与号召之下，遂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先后在中国与印度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印学会，并于一九三六年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学院。我们所拟定的中印学会与中国学院旨意：『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余年来，我个人便本此宗旨，以个人的地位与一个纯粹学者的立场，除研究讲授中印文化学术之外，对于中印两国人民的联系，也略略有所尽力。虽因环境与时势影响，未能有多大的成就，然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尤以我国抗日战争期间，全印度人民，在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三位先生的领导之下，无不对我国表示深厚的同情，并给予我们精神上以莫大的鼓舞与援助。同时我国人民也给予印度独立运动，以同样的鼓励与同情。所以现在我国中印两国人民，除了过去的友谊之外，现在，更成了一对新的患难兄弟之交了。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一九五零年印度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印两国的友谊与联系，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这几年来，两国所派的各种代表团之互相访问，尤其是一九五四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之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之访问中国；更予中印两国人民一个最巨大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感觉得无限的兴奋，无限的庆幸，与无限的希望。而两位总理先生代表中印两国所共同提议宣示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发展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指针，而且是促进全世界人类和平大同的一个伟大崇高的灯塔。

记得中印两国人民的报纸上曾经这样记载着：当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曾对毛主席祝贺说：『你已经领导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成功，希望你再出来领导世界和平运动。』我们完全赞同尼赫鲁总理这一伟大的祝贺，并愿以同样的祝贺还敬尼赫鲁总理毫无疑问，今日中国与印度两国人民，应更进一步联合起来，在我们两国伟大贤明的领袖领导下，携手前进，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以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未了且让我们同声高呼：

中国万岁！

印度万岁！

中印友好万岁！

人类和平万岁！

世界大同万岁！

（照录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印度中国新闻报）

（转载谭云山：《观光祖国诗及其他》，印度中印学会出版，1959年）

谭云山对室利阿罗频多思想的译释

朱璇

1939年11月，谭云山与其友、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的哲学系主任及室利阿罗频多学会（Sri Aurobindo Circle）主席 Sisir Kumar Mitra 教授同赴本地治理（Pondicherry），拜谒一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Mitra 教授是位虔诚的圣哲追随者，所写《室利阿罗频多与修道院》（Sri Aurobindo and His Asrama）一文，介绍阿罗频多思想、修道院情况以及他个人与阿罗频多的缘分，收入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档案和研究馆（Sri Aurobindo Ashram Archives and Research Library）中。在文中，Mitra 教授称谭云山教授是位博学的学者，对佛学造诣颇深，亦虔诚地挚爱印度。在与圣哲会面之前，谭云山已读过阿罗频多的书籍，也从朋友处了解有关修道院的理想。谭云山怀着一颗开放的心来到本地治理，待到返程时，已是思绪万千，难以言表，一方面受修道院氛围的感染，感到似乎不是修道院居于本地治理，而是本地治理居于修道院之中。另一方面，他深受阿罗频多精神进化哲学的感悟，认为阿罗频多的实践哲学在人类精神领域可谓独一无二，其强大的人格魅力与深邃的智慧之思无疑是人类思想的宝贵遗产。谭云山不禁感慨到“中国从未被任何国家所折服，除了唯一的那次，她被伟大的佛陀折服。然而这次，她将会再次为另一位印度人所折服，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

1955年8月15日，为庆祝室利阿罗频多84周年诞辰，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室利阿罗频多学会在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组织纪念会议。谭云山在会上提交名为《知觉性的觉醒——室利阿罗频多带给世界的启示》（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 Sri Aurobindo's Message to The World）一文，该文要点曾见诸报章，后由 Amrita Bazar Patrika 刊载全文。这篇文章也成为谭云山释读阿罗频多思想的主要文本。

谭云山对阿罗频多产生兴趣不是偶然，如 Mitra 教授所言，谭云山本质上可谓精神性的人。印度对个人灵魂的一贯关注，对精神性的矢志追求，从古至今，激荡人心。正如谭云山所言，在这个圣贤辈出的国度，从克里希那、佛陀、摩诃毗罗大雄到罗摩克里希南、圣诗泰戈尔、圣雄甘地和圣哲阿罗频多，圣贤们超脱的神智已融进整个民族的血脉当中，化为一股积极的力量，使这一古老国度不断获得新生。

室利阿罗频多，作为印度现代三圣之一，对印度近现代思想、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延续至今。他于187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早年在英国接受教育。21岁回到印度，在孟买和巴罗达任职和任教，并秘密结社领导革命，事发入狱，一年始出。1910年38岁的阿罗频多移居本地治理，从此闭户修行，著书弘道，终身未出。在谭云山眼里，室利阿罗频多不是印度常见的那种需要接受信众顶礼膜拜的“圣人”，他的身份，更多的是学者和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师尊和教育家，革命家和瑜伽行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古鲁和精神导师。阿罗频多的著述与思想，无疑是将印度无数圣典中所弘扬的印度精神和文明，进行新一轮的伟

大阐释。然而，正如谭云山认为的：“阿罗频多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解说者或阐释者，而是一位性灵通透的人，他是知觉性的化身。他的诗属于另一层次，其诗作《莎维特丽》（Savitri）毫无疑问媲美印度古代的圣典和史诗，如《薄伽梵歌》（Bhagavat Gita）、《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与《罗摩衍那》（Ramayana）。他将自己对《薄伽梵歌》的解读写成《薄伽梵歌论》（Essays On The Gita），这是对《薄伽梵歌》最有见地的评论。他的另一巨著《神圣人生论》（The Life Divine）面向人类存在或万物存在，可谓精神思想的巅峰。”

谭云山与阿罗频多的缘分与泰戈尔有关。深受泰戈尔赏识的谭云山，作为其终生的学生和朋友，对印度现代三圣之间的情谊必是深有感悟的。泰戈尔和阿罗频多惺惺相惜，互相唱酬，泰戈尔曾回忆第一次见到阿罗频多本人时的情形，发现“他的脸上有一种内在的光芒，他如此安详，使我切实地感觉到，他的灵魂未被专制的教条削弱和束缚。相反，他以简朴生活为乐。从他那里，我听到了来自远古修行者的声音，那份宁静遍入众生，给予人类灵魂以自由。我对他说，我们等待接受您的‘话语’，印度将通过您而发声：请听我说啊。”泰戈尔曾在1907年8月作《致奥罗宾陀》一诗献给圣哲阿罗频多，阿罗频多亦翻译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集 Lipika: Prose Poems，并为之作序，作为酬答。

众所周知，阿罗频多思想精深广博，意涵丰腴，加之其论述风格磅礴且精微，似推宕飘忽，却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玄思者爱其高邈深远的思想意境，义理者好其纹络清晰的逻辑思辨。正因为此，印度不少专治阿氏之学者，视阿罗频多为神明，其著作为圣典，一头栽进汪洋恣肆的文海中，皓首穷经，沉迷于对字句的纠缠，难免令研究者深陷迷津。谭云山对阿罗频多的释读，不是这样的路数，而是沿承其一贯的整体思维，少言精粹，点到为止。在《知觉性的觉醒》一文中，谭云山以“知觉性”这一关键语汇作为切入点，文章不长，但直击要点，涉及印中思想的比较，很有新意。

谭云山认为，阿罗频多对世界的特别启示在于，唤醒古老的知觉性。知觉性并非阿罗频多首创，而是他对千百年来印度达磨（法）和雅利安真理的重新发现。凡夫俗子之所以将人生视为苦难之旅，将世间变成充满仇恨、冲突和挣扎的竞技场，根因在于他们本初的知觉性受到了蒙蔽和阻滞。因此在这危机之际，重倡唤醒个人的知觉灵魂，不失为伟大、重要的启示。

“知觉性”（Consciousness），舶来之词，为阿罗频多借用。谭云山指出，西方学者、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知觉性价值和真实存在的认知逊于东方。他们将“知觉性”等同于“意识”，认为其是大脑的一种反应。如今虽逐渐认识到潜意识在生理和精神机能上的重要性，但仍局限在心理层面，更未达到阿罗频多所谈的超意识（super-consciousness）层面。

回到阿罗频多对知觉性的阐释，知觉性出现在精神升降论之中。精神升降论是阿罗频多学说的亮点与基石之一，其内容是将精神运动分成下降和上升两个过程。下降半圈又称高级半圈，是神圣知觉性向万物蔓衍和分有的过程，有“存在”（existence）、“知觉性·力量”（consciousness-force）、“福乐”（bliss）和“超心思”（super-mind）四个方面，运动过程为“神圣者”从纯粹“存在”下降，经过“知觉性·力量”与“福乐”的活动，及“超心思”的中介物，入乎宇宙有体。上升半圈又称低级半圈，是万物通过意识自觉，进行精神进化的运动，

有“物质”(matter)、“生命”(life)、“性灵”(psyche)和“心思”(mind)四个范畴，普通人从“物质”上升，经过一发展着的生命，心灵与心思，到达“超心思”的中介，进而升入神圣有体。超心思是下降与上升半圈中的工具和手段。在这一升降过程中，“知觉性”位列下降半圈，也是精神高级半圈的次高位阶。

谭云山认为，根据阿罗频多所阐释的印度达磨或雅利安真理，知觉性实际上是由不同形式呈现、由不同名称表达的终极实在，其本质仍是宇宙的至高原则，与正理胜论哲学里的“阿特曼”(Atma)，数论瑜伽哲学所谓“神我”(Purusha)和吠檀多思想里的‘梵’(Brahman)并无二致。“知觉性”、“阿特曼”、“神我”、梵等称，虽异文别用，其要皆仍表本体，均意指初始的、遍在的、遍入的、无所不包的、意涵一切的、全知全能的终极实在。

在此，谭云山所要论述的重点不是“知觉性”的形而上意涵，而是阿罗频多竭力在他的论述中，感悟到个体内在精神的召唤，唤醒被沉睡、蒙蔽和阻滞的神圣知觉，驾驭意志对这一认识进行实践。这才是谭云山之所以称阿罗频多之学为生活的实践哲学的原因所在。毫无疑问，知觉性纵然不可能与“梵”、“阿特曼”或“神我”完全等同，但谭云山注意到一点，位列次高位阶的知觉性，虽彰显于此，却并不被此位阶所局限，也并非不存在高于知觉性的其他真理，谭云山敏锐地注意到，“存在-知觉性·力-福乐”之所以被阿罗频多视为进化阶序的最后三层，实为解释和理解的方便。

这一论断，可谓击中要核，一语中的。我们知道，在奥义书中，“梵”的相为“识”(vijñāna)、“智”(prājñā)、“知”(cit)、“有”(存在，sat)、“喜乐”(ānanda)，后吠檀多学者公认实有(有)、智识和喜乐为“梵”之三相，并将三者整理为一句“sacidanandam”来定义梵。其中有即是智，智即是喜，喜即是有。阿罗频多沿袭梵的“真、智、乐”三相，并与他自己的学说绝对者乃“存在-知觉性-福乐”之三位一体相比照，存在、知觉性、福乐均为梵之相。这样，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何以要将已定型的学理用语再度置换新词？谭云山便从为学之用的角度解答了这一疑惑。

阿罗频多哲学不是要独创一个哲学体系，不是要以“存在-知觉性·力量-福乐”替代奥义书的“真-智-乐”，或为“梵”或“神我”另加一个指涉名称，而是试图消解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梵”所带来的过于笼统和含糊的意蕴，避免其沦为一空泛抽象的概念而非切实可行的行事原则，削弱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阿罗频多借用印度古老的知觉性与十九世纪西方兴起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将知觉性分解、细化成多个层次，适用于不同用途，从实践角度重塑知觉性的内涵。所以我们看到，阿罗频多将知觉性与每个人心灵中都存有的“心思”相联系，但这一“心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想法或感觉，而是一个原本实存的高级整体，下降分化到每一个个体心灵，并有待个体心灵的唤醒和挖掘，这便是连接上升半圈与下降半圈的中介——“超心思”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超心思因原初的创造权能，上接神圣，下济个体，只是被个体心灵所隐蔽，但普通的心思仍分有超心思的因子。另一方面，超心思也是心思进化的理想和终极目的，个体心思需要进过修炼以期获得进化上升至超心思。紧接着，谭云山根据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引述了一些略有差异的知觉性用语以描述知觉性的功能。如“生命知觉性”、“心思知觉性”、“高上心思知觉性”、“超心思知觉性”等，

并发现不同的表达是为了在不同语境下，与不同的叙述情形相符合。根据徐梵澄的中译，不少用语虽英文用词有别，但中译却一样，比如 mind-consciousness 与 mental-consciousness 均译为“心思（的）知觉性”；overmind-consciousness 与 overmental-consciousness 均译为“高上心思知觉性”；supermind-consciousness 与 supramental-consciousness 均译为“超心思知觉性”；cosmic-consciousness 与 universal-consciousness 均译为“宇宙知觉性”。而且有些用语相对重要，有些则并不常见，这可能如谭云山所解释的，为了适应论述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即如何正确认知不同叙述语境下这些话语背后的内涵，即梳理出在怎样的论述背景下，以哪一种或哪一组词汇更为常用的问题。

谭云山发现，阿罗频多的精神进化论与佛教的八识（asau vijñāni）有诸多共通之处。佛教瑜伽行派和法相宗讲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等八类识。谭云山认为前五识是认识的感知工具，意识是全息观察的智慧，末那识是静敛之智慧，阿赖耶识有所藏义，则是“全景式智慧之镜”。虽然阿罗频多的精神进化哲学是“明”与“无明”的两相呼应，不似法相宗八识的进阶次序，但作为认识工具的末那之识，不仅存在佛教思想当中，也多见于印度哲学各流派中，阿罗频多对此也曾略述一二。阿罗频多认为，印度哲学里知觉性的第六识，也是唯一之识——“末那”，超越了眼、耳、鼻、舌、身五识。前五识虽是我们观察现象有效的手段，却难以查明真理，因为真理常常“遁乎识外”，非经验手段所能证明，但我们却在无形中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感知着真实的自我意识，其原因正是“直觉”在发生作用。直觉作为末那之识，属心思的一种，但以超心思为源头，于是直觉成为心思与超心思的共通者，相当于“高上心思”，同时连接无上的“明”与遍在的“无明”，根连原始隐秘的高上神秘，又作用于心思的无明之中，并将其知觉性本身隐藏在这种双向作用的行为当中：直觉一方面受“超心思的真理知觉性”分有，决定着低等半圈的一切运动，并将之与至上的“真理知觉性”相接，但同时也以其璀璨的黄金之幔，障覆了那更伟大的“真理”的面庞，使我们的心思不复得见。若“高上心思”的直觉可比末那识，超心思则可大致理解为阿赖耶识了。

相异思想的理解，往往从比较中更易把握。于是谭云山谈中印思想里精神性的互通，并将知觉性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思想里的“性”、“心”、“德”等概念进行比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易经·乾》）中“性命”分别释译为“神圣知觉性”（divine consciousness）和生命（life）；“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中的“性”亦有知觉性的本性之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中“天命之性”即自然的知觉性。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经》）中“道心”可与知觉性对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中“德”有知觉性之意。而到陆王心学，“心”、“良知”成为知觉性的代名词。谭云山又将知觉性的特点归纳为孟子所谓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其核心便是仁、义、礼、智。

谭云山推崇中印学，中印思想常常比照而谈，当谈到知觉性的觉醒时，谭云山认识到这不仅是阿罗频多对印度古老真理的再发现、再阐释，其实这也是中国人民对古老的“道”的真理的再发现。中印思想共通互惠，这也是他一贯认为的“印度的根本思想‘和爱’，‘和’

即‘和平’；‘爱’即‘仁爱’。因‘和平’故重‘亲善’，不重‘斗争’。因‘仁爱’，故重‘慈悲’，不主‘残忍’。与中国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及‘道平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思想大致相同。但印度的“和爱”思想，比较更来的切实，更来得澈底。”

谭云山在阿罗频多研习上，虽论述不多，但所谈仍是目前中国治阿氏之学的要旨。其后，徐梵澄著《陆王学述》，其目的也与之有关。徐梵澄认为世界上真正称得上精神哲学的，仅阿罗频多一家，出自古希腊、罗马一系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不是没有，而是需要重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其所以异于纯粹思辨哲学者，则在乎躬行实践，内外交修，求其实证，即所谓‘自得’，态度仍是科学的，脱出了玄虚。终期于转化人生，改善个人与社会，那么，亦可谓此为实用精神哲学。”如此看来，徐梵澄为陆、王正名、宣扬，即是受阿罗频多影响，而这种影响。从谭云山到徐梵澄，直至现代学者，从未间断过。毕竟，人类的心智永远是相通的、不断进步的。

【书讯】

《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出版

【基本信息】

书名：《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

主编：蔡枫、黄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 年 4 月

【内容简介】

《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收录的文章分中印文化对话、印度文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三个专题，既有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的文明对话，又有印度总统等政要的演讲文稿。内容涵盖中印政治、经济、哲学、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选文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深邃，具有重要的代表性。附录部分是深圳大学印度文献选登，简要地记录了深圳大学 20 多年来的中印学术交流概况和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是当今中印两大民族友好交往的一个生动缩影。

【评论文章】

《中国与印度：文明的对话——评〈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黄河，深圳特区报，2011年7月22日。

中国与印度：文明的对话

黄河

“龙象之争”喧嚣四起

大约十年前，一位在华为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研究中心来了几位印度同事，因为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那似乎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真实存在。

在此之前，印度给我的印象遥远而缥缈：它似乎跟中国打过一战（因为疆界问题）；在它的神话里有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知道跟孙悟空有没有关系）；它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中国却变了成正统的继承者）……与远在大洋彼岸的“Europe”和“America”相比，这个毗邻而居国度对我而言，反倒更像一段神话或者历史。

短短十多年后，随着中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际经济中“亚洲世纪”的到来，世界的目光突然聚集到了这对埋头发展经济的“难兄难弟”身上。在经历了近百年共同的苦难之后，两个国家一夜之间却似乎变成了“国际经济”拳击台上的对手。

一时间“龙象之争”喧嚣四起，所有的观众都在台下吹着口哨跺着脚，向两位参赛者许诺：谁打赢了就把“亚洲世纪”奖给他。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人，在打量印度之时，便不免带上了几分拳击手式的警惕与算计。

他们或许也会像我一样，将“印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季羨林教授那样古典而优雅的学术性研究，类似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类则是强调数据和实证分析的应用研究，就像现代的经济学或管理学。

在我心目中，身为季羨林高足的郁龙余教授在深圳大学创办的“印度研究中心”，显然应该走的是“古典派”研究方向。这种研究自有其深远的价值，但对于当下中印两国的“拳击赛”中，是否能够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我自己是颇有些疑虑的。

然而，在我打开研究中心两位年轻教师主编的“印度学研究文选”《跬步集》时，这些疑虑与担忧不翼而飞，留下的只是惭愧和惊喜：惭愧于自己对当代中印文明沟通理解之肤浅，惊喜则在于突然发现原来两大文明古国的交流，除近百年西方语境下的竞争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广阔的维度：那就是“文明的对话”。

文明的对话“是广阔的纬度”

正如多位学者在本书中分别论述的那样：西方社会在“个体理性选择”的价值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逞强文明”（泰戈尔语）；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在“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的核心价值体系里，分别演化出了“天下大同”与“天下一家”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文明理想。

相似之处在于，两大文明中“人的存在”都不是西方文明下的“原子化个体”，而是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体”。但由于欧美文明对“非原子化”的存在模式缺乏理解，使得中印文明之间的许多深层差异，无法在以欧美文明为主流话语的现代语境下得以研究和表述。

对此，多年从事中印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郁龙余教授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一文中，郁教授指出，在世界文明中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只有中国和印度。“而我们中国的印度研究专家中相当大的比例，停留在技术或数据分析上，对印度的精神文化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因此而陷入西方化的“冷战思维”模式中。

他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二者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和理解。”写到此处，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忍不住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对“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这两个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无认识，是一定搞不好中印关系研究的。

这并不是一位埋首书斋的学者的意气之言，而是一个日益扩展的“观念共同体”的一部份：郁教授编著的《梵典与华章》，成为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赞赏和引用的“当代经典”；而印度经济学家兰密施所创造的“Chindia”一词，也在深圳大学正式获得了“中印大同”这一意味深长的中文名称。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妮亚·甘地200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印关系是两大文明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贸易伙伴或两个国家的一般关系。”而在19年前，她的丈夫，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在同一个演坛上呼吁：“我们的历史赋予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对全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印度和中国同心同德可以为世界新秩序提供崭新的观念……”

中印文明沟通中的“桥头堡”深圳

2008年1月，在与温家宝总理就“21世纪的共同愿望”达成共识第二天，辛格总理在演讲中表示，面对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这一“催人振兴的历史时刻”。中印两国应该形成以下共识，“我们必须确保印度和中国共同合作，联手创建一个拥有积极的外部环境和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是基于力量制衡的算计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理想中的“中印大同”，首先必须在两国人民之间搭建起“认识的桥梁”。

《跬步集》第一部份中，以“中印文明对话”为题收录的一系列对话与演讲，生动地展示出了中印两国学界乃至政商高层，对于这一“文明对话”的渴望与期待，也是本书的华彩

之章，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均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所获得的独家授权。

而在其后的“印度文化研究”与“印度文学研究”部份，郁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显示出扎实的研究根底与广阔的研究视野。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从文学到文化的基础研究，“文明对话”才不至于变成概念游戏和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凭借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印度获得广泛声誉的郁龙余教授又有了新的理想：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拜访中，郁教授向我表示，他的研究中心以印度总理、印度执政联盟的主席和驻华大使等人捐出的稿费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基金，目前正在准备捐给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家小学。而他自己则希望以这笔捐赠为契机，创建一支长期运作的中印教育慈善基金。

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以资助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了的汉语经典印译工作。“我们现在在做的是《道德经》的印度语译本。”郁教授觉得，对于在过去数千年间翻译吸收了大量印度典籍的中华文明而言，今天的回馈可谓“正当其时”——而这也正是文明对话的题中之义。

听着郁教授兴奋的讲述，我突然想起在《跬步集》中看到的一则资料：21世纪初，只有9家中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了合营企业，而深圳周边的华为、康佳和TCL就占了三家——对于深圳这座以“沟通世界”为使命的城市而言，成为中印文明沟通中的另一座“桥头堡”，难道不也是“题中之义”吗？



【历史映像】



2月6日，郁龙余教授做客印度国宝级学者、杰出印度学家洛克希·金德尔之家。



2月6日，郁龙余教授做客杰出梵文学家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之家。



2月19日，郁龙余教授访问印度的中国学院。



2月15日，郁龙余教授访问孟买大学梵文系。

(内部资料)